

程应峰

写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经典名句的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称“初唐四杰”。

王勃自幼聪慧好学，六岁即能写赋诗写文章，文笔流畅，构思巧妙，诗情英迈，有“神童”之誉；九岁时，读颜师古所注《汉书》，有感而发撰写了《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漏之处；不到十岁，王勃便饱览了六经的全部内容；十二岁至十四岁时，王勃跟随曹元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难经》等，对“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匮之数”有所知晓。公元666年，王勃十六岁时，高宗下诏对贫寒学子设立幽素科开考，王勃应幽素举，对台策，颇受考官吏部员外郎皇甫常伯的赏识，当科及第，被拜为朝散郎，成为朝廷里难得一见的少年命官。

被授朝散郎后，才思泉涌、笔端生花的王勃，撰写了《乾元殿颂》，文章一出，便被口口相传，很快惊动了圣听。唐高宗见此颂词，歌功颂德，词美义壮，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为，惊叹：“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

不久，王勃任沛王府修撰，他的才气很快赢得了沛王李贤的欢心。一次，沛王李贤与英王李哲斗鸡，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讨伐英王的斗鸡，以此为沛王助兴。不料此文也传到了唐高宗手中，唐高宗读毕，大为不悦，怒而叹道：“歪才，歪才！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反倒作檄文，有意虚构，夸大事态，此人应立即逐出王府。”就这样，王勃被逐出长安，本当大好的仕途因斗鸡文毁于一旦。

之后的三年，王勃只身飘零，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三年后，王勃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季友当时为虢州司法，说虢州药物丰富，而他知医识药，便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参军之职。就在他任虢州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相传被他藏匿了起来，后来他怕走漏风声，便杀死了曹达。就这事，他被判了死罪。幸遇天下大赦，他才得以保住性命。王勃为何保护罪犯曹达，又将其杀死？新旧《唐书》有载，王勃此次被祸，是因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或为同僚设计陷害，或干脆就是无中生有的诬陷。王勃这次被祸，虽遇大赦未丢掉性命，但在仕途上已是心灰意冷。

王勃被祸，他的父亲王福畴受到连累，从雍州司功参军被贬为交趾县令，远谪南荒之外。这件事对王勃的打击，远远超过他所受的牢狱之灾。王勃出狱后，在家里滞留了一些时日，其间，朝廷宣布恢复他的旧职，但他已视宦海为畏途，没有赴任。

25岁那年秋天，对父亲心怀愧疚的王勃，有心去探望在南荒之地交趾任职的父亲，便从洛阳出发沿运河南下，于八月中旬到达淮阴，又从淮阴到楚州，离开楚州，继续沿运河南下，入长江后折向西行，到了江宁，其间，他写下了《山中》一诗：“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翌年夏天，26岁的王勃终于在交趾见到了生活困窘、落拓潦倒的父亲。秋后，王勃辞别父亲，踏上归途。不想这一别就是永诀，在南海，遇狂浪卷覆，王勃不幸溺水身亡。就这样，在一个落寞悲凉的秋天里，王勃相拥碧波，与长天融为一体了。

也就在这一年，王勃十四岁所作的《滕王阁序》在长安城里不胫而走。唐高宗也读到这篇序文，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不禁拍案惊道：“此乃千古绝唱，真天才也。”又读下去，见一首四韵八句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唐高宗一扫成见，连声叹道：“好诗！好诗！作了一篇长文，还有如此好诗随后，岂非强弩之末尚能穿七札乎！真乃罕世之才，罕世之才啊！当年朕因斗鸡文逐斥了他，是朕之错也。”于是高宗问道：“现下，王勃在何处？朕要召他入朝！”太监吞吐答道：“王勃已然落水而亡。”唐高宗长叹三声：“可惜——可惜——可惜啊！”

王勃短暂的一生，才华横溢，文采斐然；身秉傲骨，鄙视傲物；蔑视尘俗，崇信佛教。他的诗章，或气势磅礴，雄浑壮阔；或生机灵动，绚丽多姿；或优美静谧，隐约迷蒙；或悲切感伤，如幻似梦。他的诗，更多的，倾注着一股郁积之气，深沉悲凉，令人扼腕。

在海南的汪曾祺：充满童真和欢喜的“老头儿”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海南作家眼中的汪曾祺

汪曾祺青年时代就读于抗战时期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亲聆梅贻琦、刘文典、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冯友兰、闻一多、金岳霖、吴宓、唐兰等名师教诲，小说创作更得沈从文先生悉心指导，沈从文一直也只承认汪曾祺是他弟子。

因为谁都知道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很多与汪老有交往的作家或多或少都会跟他聊有关沈从文的话题。香港三联书店编辑蔡嘉莘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汪曾祺相当敬佩沈老，他说不仅沈老本人，“师母和孩子们也都是情操、境界很高的人”，沈老将稿费捐给湘西，家里人人赞成。

早在中学时代，汪曾祺就对沈从文小说一见倾心。到西南联大后，沈从文开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选了。沈老常把他的小说（当时汪曾祺念一年级），拿去教四年级学生的课。沈从文向别人推荐汪曾祺时说：“他写得比我好。”

西南联大的习作课上，汪曾祺写了最早的小说《悒郁》和《灯下》。《灯下》记店铺上灯后的各色人物，在沈从文指导下几经修改（最后一稿完成于抗战胜利后），定名为《异秉》，刊于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十期。

汪曾祺始终视沈从文为文学上的恩师，一生执弟子礼甚恭。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汪曾祺有多篇文章阐发沈从文小说特色及文学史地位，是那个时期重新肯定沈从文的潮流中最可贵的研究成果之一。

蔡嘉莘曾问汪曾祺，沈从文后来不写小说了，是否会不甘心？汪老认为未必，他说，沈从文研究古代服饰，也是侧重文化艺术的角度，与小说创作实际上很有共通之处。

海南作家眼中的汪曾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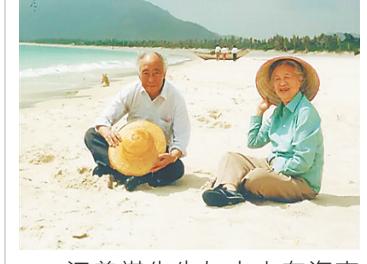
“海蓝山绿草长青，天淡云闲爽气清。更喜才人多得所，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海南作家黄宏地收藏的汪老墨宝里的诗句，这是汪老的诗。黄宏地一共收藏了两幅汪老墨宝，一幅是汪老的诗，另一幅写的是苏东坡《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的最后一联“杳杳天低鹤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说起来，汪曾祺先生与海南颇有渊源。

1993年2月20日至26日，汪曾祺先生与夫人施松卿受邀来海南参加“首届蓝星笔会”，黄宏地曾与他有过不少交流，汪老还亲切地向黄宏地赠书及书画作品。据黄宏地回忆，蓝星笔会是由海南作家潘军发起的。首届蓝星笔会办得像模像样，邀请到刘恒、苏童、叶兆言、王朔、格非、方方等不少著名作家。

黄宏地是汪老的书迷，开会期间，特地坐在汪老旁边。在黄宏地印象中，汪老人很随和，向他求墨宝，他答应得很痛快。“汪老待人很随和，不仅很爽快答应送我墨宝，对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也很慷慨。”当时汪老下榻在海口长堤路上的金福酒店，汪老在酒店为黄宏地题字时，突然跑进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开口就向汪老索字，周围的人都很惊讶，但汪老应允了，也为他写了一幅字。

黄宏地坦言，他对这个小插曲印象深刻，后来还在网上读到过这



汪曾祺先生与夫人在海南（摄于1993年）。

他，既是文学家，又是美食家，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且著作颇丰。

他跟海南颇有渊源，上世纪90年代，曾携夫人到海南参加笔会，与海南的作家们相处甚欢，还曾因为一个菠萝蜜生出许多故事。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他是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适逢农历庚申年元宵，肖猴。2020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为纪念曾祺先生，天津人民出版社付梓《百年曾祺：1920—2020》，全方位展示了汪老的逸闻趣事。



汪曾祺晚年。

读史侧翼

众所周知，清末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但鲜为人知的是，福州人廖鸿荃是其老师。那么，两人之间有着怎样的交集和故事呢？

廖鸿荃，初名金城，字应礼、斯和，号钰夫，祖先从长乐迁入省城，家住侯官县（今福州）北大街。

在福州廖氏家族第五代兄弟中，廖鸿荃年龄较小，聪明能干，由于身体弱，他9岁才去上学，但他很聪明，记忆力也很惊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连老师也连连夸赞，并且跟很多人说廖鸿荃天资聪颖，肯定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将来必成大器。

廖鸿荃“起家寒唆，空所依傍”。无显赫背景，全靠努力读书，日后才有可能踏入仕途。廖

少年时考入福州最有名的鳌峰书院，与他同学的有林则徐等，据说是书院三大才子之一。嘉庆九年（1804），他与其兄廖鸿苞一起中举人，时年20岁。嘉庆十四年（1809），他与其另一兄长廖鸿藻一起考中进士。廖鸿荃殿试得一甲二名（榜眼），即授翰林院编修。嘉庆年间，廖氏弟兄五人，三人中进士，且都是翰林，二人中举人，所谓“五子登科”，也算是福州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

廖鸿荃是老福州城内清代官员最高者之一，官至工部尚书、太常寺卿、协办大学士。

他从小身体不好，但成为了家族中寿命最长的，享年88岁，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同治四

曾国藩感遇廖鸿荃

■ 赖晨

年（1865）正月，其一生，经历了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

廖鸿荃一生共总裁会试一次，典乡试三次，分校京兆试三次，以及朝考阅卷、殿试读卷和督学贵州、江苏、浙江、陕西等省，门生遍布天下，其中，曾国藩就是他举荐的。

曾国藩考中举人之后，分别于1835年和1836年参加了两次会试，其中1836年遇上皇太后六十大寿，故增加了一次会试，俗称恩科。但不幸的是，曾国藩均名落孙山。1836年，曾国藩回湖南，因为缺少盘缠，他从老乡、江苏睢宁知县易作梅处借了100两银子，这是易作梅两年多的俸禄，当时易作梅的年俸为45两白银。

道光十八年（1838），朝廷将举行会试，因为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这年的会试被称为“戊戌会试”。

曾国藩从亲友处借来33吊钱，从湖南湘乡赴京。他知道这笔钱来之不易，一路省吃俭用，到了京城，身上只剩下三吊钱了。

这年三月的礼部会试，廖鸿荃以工部右侍郎的身份任副主考。

四月，曾国藩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属下等，得赐同进士出身。五月初二，由礼部堂官引见，朝见道光皇帝；因答对明白、条理清晰，加之衣着朴素，深得道光赞赏，被破格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进士入翰林，清朝开国以来仅曾国藩一人。

正是在这次戊戌会试中，廖鸿荃力荐曾国藩，为国家选拔栋梁之材。曾国藩也感谢廖鸿荃的知遇之恩，经常称他为“廖老师”。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代人才教育观中的“德”

■ 黄峰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中“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和“自我完善”等人才教育理念，对今天的干部培养和成长都具有积极意义。

以德为先。中国传统文化格外强调道德和伦理。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开篇就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周易》里也讲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认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提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在古代传统社会，官员的政治标准，首先应是道德上的贤人，然后才是政治上的执政者，即所谓“修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左传》中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排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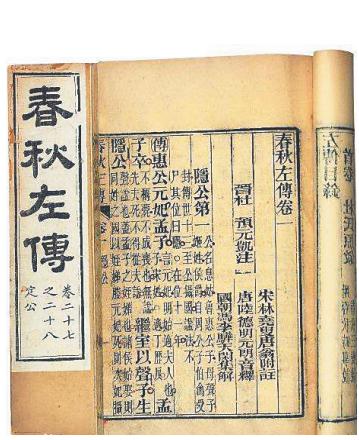
第一位。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正统的知识分子大多希望通过居官从政这一途径来济世益民，把从政实践中为圣为贤作为人生的至高目的。在今天的干部教育培养中，我们仍然要强调“德”的重要性，要把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党员干部成为新时期道德上的楷模，进而来推动全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德才兼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德”在先的同时，也突出了“才”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早在尧舜禹时代，我国就有了“选贤、用能”的传统。推举有德之舜继任尧就是很好的明证。汉代著名儒学大家董仲舒提出，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受教育者“必仁且智”，并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他认为，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是根本，但必须德才兼备，二者不可或缺，否则就不完美。孟子强调：“不信仁贤，则国空虚。”韩非亦力主用贤，强调发挥个人的“才能”，其曰：“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宋代著名改革家王安石曾提出：“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这说明王安石更是注重“选贤任能”，认为选拔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才是治理国家、进行社会改革的头等大事。当前，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对培养干部的“才能”要求更加突出，党员干部只有努力提高治国理政的本领，真正做到“德才兼备”，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命。

道德完善。孔子讲“德不孤、

必有邻”，张衡言“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从古至今，中国就是一个崇尚道德、遵守道德的国家，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道德的完善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是一个极其漫长不断自我修炼的过程，需要通过持续的修身、慎独、克己才能达成。修身是道德完善的基本功，它甚至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慎独，指的是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依靠内在的道德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荀子认为慎独是实现至高道德目标的载体，他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慎独是官员道德践行的重要方法，也是检验官员道德修养成效的标准之一。克己。指的就是要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克制自己的私欲。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事实上，克己也是官员进行修身的起点和前提，缺乏个人的自我严格要求，修身也就无从谈起。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推崇，这份求学做人的追求值得后世千古传诵。相对于古人，作为当今社会建设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党员干部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做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理想信念坚定，努力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据《学习时报》）



《左传》。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